

元季色目士人的社會網絡：以僕百遼遜 青年時代為中心

蕭啟慶*

元代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族群間的社會文化互動因而構成元史研究的重要焦點，而蒙古、色目人的漢化尤為學者重視的一個課題。

本文主要根據最近在韓國新發現的一本詩集——《近思齋逸稿》，對元季色目士人——僕百遼遜（1319-1360）——青年時代的社會網絡作一較為詳盡的考索。

本文核心六節勾勒出一個青年色目士人如何與家人、親戚、老師、朋友乃至方外之士互動，並由這種互動去了解色目青年的成長過程、人格塑造及其與周遭社會的關係。希望這種研析不僅反映一個色目青年在元季江南社會中成長的過程，也能顯示當時族際社會文化互動的整體方向。

本文顯示：百遼遜所承繼與營造的是一個青年科第士人的社會網絡，與漢族士人差別不大。但是，由於僕氏家族持續與本族聯姻，而且直至百遼遜一代仍然保持畏兀兒式的名字，反映僕氏仍未完全放棄原有之族群認同，若說此一家族在當時已經完全「漢化」，或許不免引起爭議。但由百遼遜的社會網絡看來，稱之為「士人化」，應屬允當。因其交往皆以士人為對象，並且以具有普世價值的士人文化為互動基礎，超越了族群鴻溝與地域藩籬。僕氏無疑為一士人化的色目家族，而百遼遜則為一青年士人。

關鍵詞：元朝 色目 社會網絡 僕百遼遜 士人化

* 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引言

元代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在中國史上前所罕見。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徙入中原、江南，與漢人、南人共存共榮，相互涵化。族群間的社會文化互動因而構成中國史上有趣的一章，也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焦點。

關於元代族群間的社會文化互動，陳垣先生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早已證明色目人的漢文化造詣甚高者比比皆是。¹ 十餘年前，筆者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及〈元代蒙古人的漢化〉二文，² 也顯示蒙古人並不盡是漢族士大夫文化的門外漢，不少蒙古人具有很高的漢學成就。近幾年來，筆者又出版了一系列有關元代蒙古、色目士人層與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的論文，³ 這些論文顯示：元朝中期以後，一個人數雖不龐大，卻是日益擴張的蒙古、色目士人群體業已出現。這一個異族士人群體並非孤立於漢族士大夫主流之外，而是與後者聲氣相通，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各族士人間的共同群體意識已經超越族群藩籬，遂形成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多族士人圈。不過上述的論著皆較宏觀，具體的個案研究應可加深對蒙古、色目與漢族士人的社會文化互動的瞭解。

本文探討的主要對象契百遼遜（百亦作伯，遜亦作孫，1319-1360），出身於畏兀兒族中著名世家——高昌契氏。⁴ 契氏在漠北及西域突厥民族所建各政權——突厥汗國、回鶻汗國及西州回鶻（即畏兀兒）——之中皆為核心統治家族之一，

¹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1935）。

² 二文收入蕭啟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頁95-216，219-264。

³ 關於多族士人圈，參看蕭啟慶以下各文：〈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203-242；〈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8.2(1999)：66-73；〈元代蒙古色目士人層的形成與發展〉，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回饋——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68-183；〈元朝多族士人的雅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6(1997)：179-203；〈元代各族士人間的文化互動：書緣〉，《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臺北：簡牘學會，1997），頁349-379。

⁴ 關於契氏家族之歷史，參看蕭啟慶，〈蒙元時代高昌契氏的仕宦與漢化〉，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頁243-297。楊鐔，〈高昌契氏：詩與史〉，收入楊氏《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246-264。

「世爲國相」。歸順蒙古後，仍是累世顯宦。偃氏徙入中原後，定居江南，漢化頗早且深，成爲元朝最成功的科第世家。百遼遜即是由科舉入仕。元末亂起，百遼遜攜子弟亡命高麗，其子孫在韓國繁衍至今。⁵ 偃氏家族的歷史是中國史上乃至亞洲史上獨特而有趣的一頁，而百遼遜的一生亦極具傳奇性。

偃百遼遜傳世的唯一著作《近思齋逸稿》的流傳亦充滿曲折。⁶ 此書原由百遼遜自編于元京大都。元末亂中，原稿亡佚。至正十八年（1358）抵達高麗後，憑記憶重構此書。百遼遜卒後，重構本原稿因戰亂再遭散失，僅百遼遜在江南時所撰詩仍存。洪武五年（1372）其長子長壽（1341-1399）刊行此書殘存部分。有高麗著名士大夫李穡（1328-1396）及長壽所作之跋。朝鮮高宗八年（清同治十年，1871），偃氏後裔將《逸稿》及百遼遜子孫的文集與相關記錄合編爲《慶州偃氏諸賢實記》並於當年刊行，原刊本現已成孤本，另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藏有抄本。⁷ 這兩種版本在韓國極難見到，更從未傳入中國。本文的主要根據即爲《諸賢實記》抄本之影本。

《諸賢實記》中之《逸稿》錄有詩八十一題，一一一首，文一篇。減去羈入的他人詩作五首，⁸ 含百遼遜的詩歌一〇八首。在這一〇八首中，作於至正五年（1345）登第并北上任官後的詩作有五篇，⁹ 赴高麗途中及抵達後所作有四篇。¹⁰ 其餘三分之二皆爲百遼遜在江南時的作品，上起至元元年（即元統三年，1335），下訖至正五年登第，前後十年，亦即百遼遜十七歲至二十七歲的青年歲月。本文即以百遼遜在這十年中的作品爲研析對象。

⁵ 關於偃氏徙入高麗經過及其子孫在高麗之事跡，參看葉泉宏，〈偃氏家族與元末鮮初之中韓關係〉，《韓國學報》12(1993)：59-79；桂栖鵬、尚衍斌，〈談明初之中朝交往的兩位使者——偃長壽、偃斯〉，《民族研究》1995.5：65-69；黃時鑒，〈元代高昌偃氏入東遺事〉，載于蕭啓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店，2001），下冊，頁541-569。

⁶ 關於《逸稿》及《實記》編撰與流傳，參看朴現圭，〈回紇人偃遜《近思齋逸稿》之發掘、分析〉，《民族文學研究》1996.2：89-93。

⁷ 《慶州偃氏諸賢實記》，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藏抄本。《近思齋逸稿》爲此書卷一。因此書無頁數，以下徵引時，不記頁數。

⁸ 朴現圭認爲《東文選》中表明爲偃長壽作品之〈高秋感興〉、〈歲暮雜述〉、〈春色〉、〈書感〉及《箕雅》中金九容的〈江水〉皆非百遼遜之作品，應排除。

⁹ 北上後所作五篇爲〈崇天門下放榜口號〉（二首）、〈送樂仲本歸四明〉、〈過陵州驛次薩天錫壁間韻〉、〈永壽宮夜〉（三首）、〈過營城口號〉（二首）。

¹⁰ 起程赴高麗後所作四篇爲〈宵夢〉、〈記夢寄中朝故舊〉、〈題玉田和尚松月軒〉、〈金元吉名字說〉。

百遼遜的十載年輕歲月主要是在集慶（原建康，今南京）地區度過。十七歲時，偁氏遷至溧陽定居。由於溧陽是集慶路管轄的一個中州，而集慶是江東地區的核心，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皆較豐富，¹¹ 百遼遜經常往返於溧陽與集慶之間，而且一度在集慶的竹林精舍讀書。故集慶是他與外間世界的接觸點，而整個集慶地區則構成他十年生活的場域，而他在這場域中的生活重心則是讀書、應舉、遊覽與交友。

本文之目的有二：一為介紹一本前所罕見的元代色目人詩集的部分內容。二為主要根據這本詩集的內容，勾勒出一個青年色目士人如何與家人、親戚、老師、朋友乃至方外之士互動，並由這種互動去了解色目青年的成長過程、人格塑造及其與周遭社會的關係。希望這種研析不僅反映一個色目青年在元季江南社會中成長的過程，也能顯示當時族際社會文化互動的整體方向。

《近思齋逸稿》及百遼遜友人的詩文集是本文的主要根據。士人間的唱和詩文雖不免交際應景之作，所反映的未必是深厚的友情。但對詩文的唱酬對象及其內容加以考述應可顯示百遼遜社會網絡的寬狹與性質。

筆者於幾年前發表〈蒙元時代高昌偁氏的仕宦與漢化〉一文，探討偁氏在蒙元時代乃至高麗的歷史，可惜當時未能見及《諸賢實記》。近幾年來，有關《實記》中《逸稿》之論文相繼出現，包括朴現圭的〈回紇人偁遜《近思齋逸稿》之發掘、分析〉及黃時鑒的〈元高昌偁氏入東遺事〉。前者的重點在於考述《逸稿》的編輯過程及簡敘百遼遜生平；後者旨在探討偁氏的東遷及其在高麗的事跡與詩文。因而與本文並不重疊。三年前承蒙黃時鑒教授遠道惠寄《諸賢實記》影本，得以完成本文，謹致謝忱。

二、一生

高昌偁氏是元代蒙古色目人中浸潤漢文化最深的家族之一，也是由官宦高門轉型為科第世家最為成功者。自畏兀兒於一二〇九年歸降蒙古後，偁氏祖先備受蒙廷重用。百遼遜之高祖岳璘帖穆爾（約1196-約1262年）歷任王傅、河南都達魯花赤。曾祖合剌普華（1246-1284）官至廣東都轉運鹽使。祖父偁文質（?-1340）

¹¹ 關於集慶，參看徐桂香，《元代的集慶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以吉安路達魯花赤致仕。在當時蒙古色目世家中，偃氏雖說不上最為顯赫，卻是累世仕宦。偃氏原是突厥種人中源遠流長的知識世家。移居中原後，研習漢學起步甚早。約在蒙哥汗（1251-1259）時代，合剌普華幼時即已研習漢文典籍。元朝滅宋後，偃文質任江西行省理問，徙家江西龍興（南昌），聘師教授子弟，「書聲琅琅于東湖之上」。江西名儒劉岳申（1260-?）認為文質及早聘師教子讀書對其家族成功轉化為科第世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確是不錯。¹² 科舉恢復後，百遼遜的父輩六人聯翩登第，其本人及兩位兄弟亦接踵上榜，兩代之間一門共有九人成為進士，為當時人所盛稱：「唐宋科舉盛時，儒家世科，未有如偃氏一門兄弟之盛，天下傳為美談」。¹³

偃氏子弟不僅得意于科場之中，又多精通儒學，長於文學、藝術。百遼遜之祖父文質已有撰述。其父哲篤、伯父玉立、叔朝吾皆善於詩文、書法。¹⁴ 可說一門多才多藝。

偃氏家族又以嚴守儒家倫理見稱於當世。早期即以「三節」——父忠、母貞、子孝——聞名。後玉立兄弟六人接武登科，時人又以二事相聯，認為登科乃積善之福報，稱之為「三節六桂」。偃文質乃築三節六桂堂于其私第。當時文人名公撰文賦詩加以頌揚者甚多。後來百遼遜倉皇逃奔高麗時尚不忘隨身「懷三節祀板、錦面主東來」。¹⁵ 可見偃氏子孫對其家族篤於禮教之光榮傳統甚為珍惜。

百遼遜的父親偃哲篤（?-1358）為偃文質之第三子，登延祐二年（1315）科舉首科。至順三年（1332）任廣東道廉訪司僉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遂於至元元年「解印綬逕去，與夫人至江東」，¹⁶「歸耕溧陽」。¹⁷ 至正初年哲篤官運轉為亨通，似乎與脫脫（1314-1355）之當政有關，脫脫於至元六年（1340）推翻其伯父伯顏（?-1340）的專政，出任中書右丞相，力反伯顏的反漢反儒諸政策，推行「更化」。哲篤於此時轉至中樞任職，自至正三年（1343）起歷任中書

¹² 劉岳申，《申齋文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卷五，頁8下，〈三節六桂堂記〉。

¹³ 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五四，頁50上，〈合剌普華公墓志銘〉。

¹⁴ 蕭啓慶，〈蒙元時代高昌偃氏的仕宦與漢化〉，頁287-290。

¹⁵ 《諸賢實記》卷上，〈諸公事蹟·近思齋〉。

¹⁶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卷三九，頁17上-18下，〈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¹⁷ 《近思齋逸稿》，〈次韻徐暉登九華山詩〉。

左司員外郎等職。十年，任吏部尚書，¹⁸ 建議脫脫變更鈔法。幣制改革雖然失敗，哲篤顯然仍受重用。十二年脫脫出軍討伐紅巾芝麻李於徐州，十四年征高郵張士誠（1321-1367），哲篤皆以淮南行省左丞之職輔佐。¹⁹ 但是十五年脫脫因遭政敵中書平章哈麻（?-1356）之譖，在軍前解職并遭流放，其集團遂告瓦解，哲篤作為脫脫的重要僚屬，與哈麻有積怨，政治生命乃告完結。不久之後，卒於大寧（內蒙古寧城縣西），大寧可能是他的流放之地。

偃百遼遜，漢名偃燾，字公遠。延祐六年（1319）年生，在其父哲篤登進士第的四年之後。至元元年，其家自龍興徙居溧陽。當時，哲篤暫時退隱家居，督導諸子讀書。百遼遜在此度過十年讀書應試的生活。在其登科前曾選充御位下速古爾赤（sugurchi）。²⁰ 這一職位可能是其家族在至元二年（1336）伯顏廢止科舉後為其謀求的一個出路。速古爾赤是元代宮廷宿衛——怯薛（Kesig）的一支，「掌內府尚供衣服」。擔任怯薛是當時官宦子弟的一條登龍捷徑。怯薛成員例由三品以上官員子弟選充。高官子弟擔任怯薛後，多經「敕選」而出任官職。²¹ 百遼遜似未往大都就任。而在科舉恢復後，即重拾「舉業」，參加考試。可見偃氏家族對科舉入仕的重視。至正五年，百遼遜登二甲進士第，該科是科舉恢復後的第二科，共錄取七十八人。同年進士包括其族兄弟正宗（偃文質弟越倫質之孫），漢族同年中則有以所著傳奇《琵琶記》聞名於世的瑞安高明（1298-1359）。²²

百遼遜仕途不長，他由翰林應奉，轉任宣政院斷事官經歷及端本堂正字。端本堂設立於至正九年（1349），係改造宣文閣而設置，為皇太子學宮。²³ 正字為端本堂最低學官，秩不過正七品。²⁴ 至正十三年（1353），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1378）正式受冊封，端本堂不再設正字，百遼遜大概於此時離開此一職務。他

¹⁸ 宋濂等，《元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九七，頁2483，〈食貨志〉。

¹⁹ 李穡稱其最終職位為淮南左丞，應屬正確。鄭麟趾，《高麗史》（〔國書刊行會本〕卷一一二，頁357上-359上，〈偃遜傳〉），說偃哲篤最終職位為江西行省左丞，恐為淮南行省左丞之誤。

²⁰ 黃潛，《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頁17上-18下。

²¹ 蕭啓慶，《元代的宿衛制度》，收入蕭氏《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59-111。

²² 蕭啓慶，《元至正前期進士輯錄》，《燕京學報》10(2001)：173-209。

²³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頁171-209。

²⁴ 《元史》卷九二，頁2331，〈百官志〉。

在朝中的最後官職爲崇文監丞。²⁵ 崇文監掌翻譯與校讎圖書，²⁶ 監丞爲一從五品的官職。

百遼遜供職崇文監爲時不久，中樞的政治巨變迫使他離開朝廷。至正十四年(1354) 哈麻接任左丞相，百遼遜受到乃父牽連，外放單州(山東單縣)爲知州。哈麻當權不過一年多，十六年即被殺，因而百遼遜之外放應在十五、六年。十七年時，他在單州，今有該年樹立于當地的〈琴台詩〉碑爲證。²⁷ 十八年，哲篤逝世，百遼遜丁憂，寓大寧，²⁸ 結束了他在元朝的仕途。此年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潘率領的紅巾北伐中路軍攻下上都，迫大寧，百遼遜爲避亂，「挈子弟，單騎渡遼水，入高麗，而賊下大寧矣！」²⁹

百遼遜在東逃高麗時寫下一首五律〈宵夢〉，其詩云：

龍蛇猶格鬥，豺虎尚縱橫；不見風塵息，胡爲江漢行？

有生真大累，無地托餘生；寂寞中宵夢，淒涼去國情。

此詩是寫其去國東行時的心情。可見他乃因烽火遍地、太平無望，無法返回江漢而不得不淒涼去國，尋求方寸之地，以托餘生。事實上，一年之間，他經歷家變與國亂的雙重打擊，這可能是不願回到江漢，而棄國遠行的真正原因。

明年春，百遼遜抵松京。因其國恭愍王(1352-1374) 亦曾侍皇太子於端本堂，³⁰ 與百遼遜有舊誼，對他待遇優渥，於至正二十年(恭愍王九年，1360) 八月封他爲高昌伯，³¹ 改富原侯，百遼遜並將姓名簡化爲漢式的僕遜。³²

百遼遜在高麗雖然備受優遇，但身處異國，不免懷念昔日中朝生活，其〈記夢寄中朝故舊〉云：

²⁵ 據《近思齋逸稿》，李穡跋：「久之，承崇門監，方嚮於用，而當國者與其父淮南左丞公有怨，出知單州」。「崇門監」應爲崇文監之誤，「承」爲丞之誤。此跋亦收入李穡，《牧隱文稿》(麗季名賢集)卷七，頁3下-4下。

²⁶ 《元史》卷九二，頁2330，〈百官志〉。

²⁷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卷一二，頁50下註明：「劉宏甫撰，僕伯遼遜正書」。

²⁸ 《近思齋逸稿》，僕長壽跋。

²⁹ 《近思齋逸稿》，李穡跋。

³⁰ 恭愍王王祺於忠惠王二年(1341)以王弟身分奉詔入元廷爲宿衛。忠定王即位(1348)，王祺仍留爲宿衛(《高麗史》卷三八，頁574下，〈恭愍王世家〉)。

³¹ 《高麗史》卷三九，頁600上，〈恭愍王世家〉。

³² 《高麗史》卷一一二，頁357上-359上，〈僕遜傳〉。

於穆宣文閣，雍容端本堂；夢中猶昨日，覺後是他鄉。

萬事心如鐵，三年鬢已蒼；生還倘能遂，甘老校書郎。

宣文閣是端本堂的前身，舊日百遼遜供職端本堂，任正字，正字相當於唐宋之校書郎，王逢〈寄僕正字〉即有「君遷正字職，秩視校書郎」之句。³³ 百遼遜流離異國雖然不久，卻是鬢髮已蒼，心中仍望生還中原，甘心以校書郎終老。可見仍是心懷故國，遠遷他鄉原是不得已的決定。

二年之後，亦即至正二十年，百遼遜卒于松京典牧洞私第。³⁴ 享年僅四十二，他在高麗不過兩年，但其家自此定居高麗，子孫先後出仕高麗、朝鮮，甚為顯赫。

李穡跋《近思齋逸稿》云：

元朝進士以古文顯于世，如馬祖常伯庸、余闕廷心尤其傑然者也。…僕氏，回鶻大族，入中國為名家，登第者九人。…其文炳然，直與伯庸、廷心相上下，可傳與後者無疑。…今觀此稿，皆少作，蒼然有老氣，壯時所著，蓋可想也。³⁵

李穡以百遼遜之詩文與元代最著名的色目士人馬祖常（1279-1338）、余闕（1303-1358）相比擬，評價甚高。

百遼遜的一生顯示一個色目仕宦、科第世家子弟的經歷。他雖然以世家子弟身分取得宿衛之職，卻堅持以科舉起仕，登第之後所任多為文翰之職，可見由科舉出仕及擔任文翰之職在元季已是蒙古、色目人任官的一個重要管道。百遼遜的亡命高麗而備受優遇則是他個人的特殊際遇，與一般蒙古、色目人無關，卻為其家族的歷史增添甚大的傳奇性。

三、家族

僕氏家族文質一支遷居溧陽後，「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愍（合剌普華）而下六喪，以昭穆序墓」，顯然已決心定居於此。僕氏選擇溧陽為定居之地，一方面可能由于文質曾任職廣德，與溧陽有密切的地緣關係，另一方

³³ 王逢，《梧溪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四，頁504。

³⁴ 《近思齋逸稿》，僕長壽及李穀跋。

³⁵ 《近思齋逸稿》，李穡跋。

面應是由于溧陽的優越條件。溧陽士人孔克齊敘述江南可居之地：「金陵爲上（原註：溧陽、句容可居可田，鍾山、茅阜可遊可息）」，³⁶「可居可田」的條件，以及集慶地區的整體環境，可能便是倪氏選擇定居溧陽的一個原因。

倪氏雖然從此在溧陽生根，³⁷但在當時卻是新居民。當時文質已老，不久且逝世。³⁸而哲篤在遷居幾年之後，即已出仕中樞，並無多少時間經營地方網絡。倪氏以色目世家的身分徙入，自然獲得當地人士的注目與尊崇，但孔克齊稱哲篤爲「寓公」，³⁹尙視他爲暫時寓居的外來官宦。因而倪氏在當地沒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也沒有廣闊的人脈。

任何地區的新移民家族都有甚強凝聚力，而倪氏早已以儒家禮教凝聚家族著名於世，遷居溧陽後仍是如此。倪哲篤即以嚴格的儒家禮教訓導諸子，可由《至正直記》所記其塾師儲惟賢之言看出：

希聖（即惟賢）曰：「世南（即倪哲篤）處家甚有條理，僮僕無故不入中門，子弟亦然。自吾至館中，因知諸生居宿于外者昏定晨省，皆候于寢門之外，非奉父母命則不敢入。」蓋謂私室中父母處之，或有未謹者，則肢體袒惰，使子弟窺見非所宜，故亦防閑之也。予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嘗爲家人輩言之。⁴⁰

哲篤「非奉父母命則不敢入」於寢門的規矩顯然受儒家禮教之啓發。而百遼遜便是在這種嚴格禮教規範中長大。

由于哲篤長年遊宦於外，其妻月倫石護篤（1301-1341）是家中的支柱。月倫

³⁶ 孔齊（孔克齊），《至正直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二，頁44，〈江浙可居〉。

³⁷ 倪百遼遜一支雖遷入高麗，倪氏其他各支主要分居溧陽、南昌。百遼遜之弟倪斯（原名倪吉斯）在明朝記載中即以溧陽爲原籍（雷禮，《國朝列卿記》（明代傳記叢刊）卷二三，頁19上，〈倪斯傳〉）。在其卒後，溧陽祀之爲鄉賢。明清兩代溧陽倪氏見於記載者甚多，如以節女著稱者明代有達倪氏、倪周氏，清代有史倪氏等（李景嶧等修，《嘉慶溧陽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卷一四，頁25上-25下，〈人物志·完節〉）。據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於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四日在南京惠告：溧陽現仍有倪家村，最近該村發現元代倪氏家碑二石。而倪氏居民又曾申請改變爲少數民族戶籍，但爲當地政府所拒絕。

³⁸ 倪文質逝世於至元六年（1340），《嘉慶溧陽縣志》卷一二，頁14上。

³⁹ 《至正直記》卷四，頁155，〈文益棄母〉。

⁴⁰ 《至正直記》卷三，頁116-117，〈高昌倪哲〉。

石護篤字順貞，出身於一個漢化的畏兀兒仕宦家庭——古速魯氏。⁴¹ 其父爲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達（八）里麻吉而的（1268-1329），母親則來自另一個漢化甚深的顯赫畏兀兒家族——高昌廉氏，⁴² 爲中書左丞廉希憲（廉卜魯凱牙）之女，亦即忽必烈時代著名儒相廉希憲（1231-1280）之姪女。⁴³ 達里麻吉而的於仁宗延祐初任饒州路達魯花赤，奉命與廣德路總管偃文質共同經理田賦，二人因而結交，導致二家間的姻緣，而百遼遜的一位姐妹又嫁于廉希憲之從曾孫咬咬，二個家族之間可謂關係深厚。月倫石護篤之祖母則爲忽必烈朝另一開國功臣孟速思（1206-1267）之女，⁴⁴ 亦爲畏兀兒族。廉氏又與孟速思家族及著名曲家小雲石海涯（1286-1324）出身的賈氏家族姻緣相聯。因而偃氏與古速魯氏、廉氏、孟速思、賈氏等家族似乎構成畏兀兒人中一個漢化較深、地位顯赫的婚宦集團。⁴⁵

月倫石護篤知書達禮，尤諳女學，黃潛〈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說：

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⁴⁶

可見月倫石護篤爲當時蒙古、色目女性中漢學造詣較高者。病中曾訓諸子曰：

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和睦，毋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才驕傲輒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爲戒，吾瞑目無憾矣！

黃潛所記月倫石護篤對諸子的遺教，與儒士的家訓并無不同。百遼遜兄弟之長大成材，固然由於哲篤嚴於管教，月倫石教養之功亦不可沒。

⁴¹ 楊志玖，〈古速魯氏非回回辨〉，《寧夏社會科學》1988.3：1-2。

⁴² 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五，頁1上-4上，〈古速魯公神道碑〉。

⁴³ 關於高昌廉氏，參看 Hsiao Ch'i-ch'ing, "Lien Hsi-hsien," in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Wiesbaden, Harrasowitz, 1993), pp. 480-499; 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兀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論叢》7(1999)：123-136。

⁴⁴ 關於孟速思家族，參看 Herbert Franke, "A Sino-Uighur Family Portrait: Notes on a Woodcut from Turfan," in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4), Chap. XIII. 北村高，〈關於孟速思家族供養圖〉，《元史論叢》5(1993)：9-12。

⁴⁵ 關於偃氏與廉氏、孟速思等家族的「華化」，參看胡其德，〈元代畏兀人華化的再檢討——一個新的詮釋〉，收入蒙藏委員會等編，〈中國邊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1995），頁169-201。

⁴⁶ 黃潛，〈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頁17上-18下。

偁氏遷徙至溧陽後不久，月倫石護篤即已臥病，「不脫茵席者五年」，並於至正元年（1341）逝世，年僅四十一。今存百遼遜〈瑤池會上南極老人授長生籙辭〉五七雜言歌行之末云：「南極老人酣起舞，以手捧桃指下土，可憐小兒癡偷之意良苦。授以長生籙，請歸獻慈親，一如老人在南極，九十八萬三千春，坐看東海飛黃塵，與西王母長爲鄰」，乃是爲祝福病中慈母長壽而作。

二十歲前後，百遼遜在外求學、遊歷。客中常常想起家人。有一年旅居常州，寫下〈九日思家〉七律：

九日思家憶去年，移居東郭野橋邊。

青山當戶開秋障，紫菊成畦帶晚煙。

賴有詩書供雅好，都無車馬絕塵緣。

西風古岸毗陵道，卻駕扁舟興黯然。

毗陵乃常州古名。想起家中種種，便是遊興黯然。

又有一年百遼遜臥病金陵，寫了〈病中家奴回寄諸弟〉：

一病虐予三十日，剛餘皮骨命堪憐。

起探行囊憂如醉，卻捧家書喜欲顛。

目斷白雲飛舍下，夢回夜雨憶燈前。

老奴回日緘書罷，更寫羈愁淚滿箋。

病中接到家書，自然欣喜若狂，急忙覆信，卻不免「羈愁淚滿箋」。

百遼遜兄弟十人，其中七人長大。⁴⁷《近思齋逸稿》中有兩篇贈弟燠的詩。燠可能係其長弟偁理台，偁理台出身國子學，後任豐足倉使。一篇爲〈金陵將歸寄舍弟燠〉（二首），其第二首云：

儒術吾家事，光陰亦易過。憂懷寧有既，賢弟近如何？

風露青天溼，軒窗秋氣多。惟應理歸棹，與爾共吟哦。

另一首〈送舍弟燠遊桐川〉（二首）則是爲其弟出遊而寫的送別詩。其二云：

別離雖不遠，重是鵲鴿思。明日鞭梢動，應哦採葛詩。

都可看出他們兄弟間的手足深情及對詩歌的共同愛好。

⁴⁷ 百遼遜諸弟中，以五弟偁吉斯（入明後改名偁斯）最爲知名。吉斯仕元官至嘉定知州。歸順明朝後，累官禮部尚書，曾兩度出使高麗，與百遼遜家族重聚，參看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三三，頁4上-5上，〈禮部尚書偁公斯傳〉；Lienche Tu Fang, "Hsieh Ssu," in L. C.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59-561.

百遼遜與其伯叔亦甚親密。其父輩聯翩登第的歷史是他們仿效的對象，也構成一種壓力。其作於至元二年（1336）的〈中秋對酒歌〉便透露出這種矛盾的心情：

我家諸父六伯仲，各向天門諧令儀。

亦欲追蹤躡雲級，有約寧知忽相失。

廣寒深鎖桂香空，卻著妖蟆恣虧蝕。

翩然落魄江湖間，獨抱隱憂心孔艱。

「諸父六伯仲」乃指其父五兄弟及從父善著。百遼遜原欲步武父輩之後，應舉中第，卻因伯顏廢科而喪失「折桂」的機會，故在詩中將伯顏比之為虧蝕月華的「妖蟆」。反映了父輩對他的價值取向的深刻影響。

伯叔之中，《逸稿》僅存有與其長伯偁玉立的唱和詩。玉立，字世玉，號止堂，又號止庵，延祐五年（1318）進士。玉立是其兄弟中宦途較順，藝文成就最高者。曾任翰林待制，官至海南廉訪使。《元詩選》編者顧嗣立輯其詩，曰《世玉集》。⁴⁸ 此外尚有不少詩詞、書跡散見各處。⁴⁹ 清馮登府稱讚玉立之詩云：「亦具金台、雁門風度，是色目人之矯矯者，以入《元詩選·癸集》，允稱雞群鶴也」。⁵⁰ 馮氏顯然認為玉立之詩可與色目第一流詩人薩都刺（1272-1340）、迺賢（1309-1373）比美。馮氏又跋玉立〈泉南佛國〉四字書法石刻云：「落墨古樸，尚能自見骨力」，可見玉立書法風格頗為可觀。

約在百遼遜家徙居溧陽前後不久，偁玉立一度辭官歸隱。其〈止堂〉詩序說：

余去朝之二年，祿餘不給於食，益厭城市。瀨陽村求田數畝，結廬以居，遂得躬耕焉。扁茲室曰「止堂」，為之銘。復繫以詩，抑以見安於義命云耳。⁵¹

可見玉立在溧陽的瀨陽村，求田結廬，暫圖隱居。百遼遜〈次韻伯父待制公小蓬萊別墅之作〉大概作於此時：

⁴⁸ 顧嗣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三集庚，頁375-379。

⁴⁹ 蕭啓慶，〈蒙元時代高昌偁氏的仕宦與漢化〉，頁287-288。

⁵⁰ 馮登府，《閩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卷一二，頁16下。

⁵¹ 《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七二四一，頁21下引《溧陽志》所載偁玉立〈止堂〉詩。

瀨陽江上水雲空，恰幘山前曉霧濛。

吏隱暫辭金馬詔，神仙還住蕊珠宮。

題中之「伯父」顯然指玉立，瀨陽江即溧水，亦即今溧陽荆溪河段。小蓬萊別墅爲玉立的新居，而止堂當爲別墅的主要建築。百遼遜以此詩唱和，稱頌伯父的「吏隱」神仙生活。

總之，偁氏是溧陽的新客，百遼遜的生活是以家族爲中心，他的士人文化及仕宦科第取向皆是深受家族影響而形成。其與父母、兄弟及伯叔的關係皆是以儒家倫理與士人文化爲基礎。

四、姻戚

百遼遜與其舅氏——古速魯一族之關係甚爲親近。其外祖達里麻吉而的逝世後，即係由百遼遜撰寫行狀，此一行狀成爲危素（1303-1372）所撰〈神道碑〉的根據，⁵² 達里麻吉而的之一生行實得以傳世。

百遼遜與其伯舅丑閭、仲舅觀閭（觀驢，?-1367）皆有詩唱和。丑閭字時中，自英宗怯薛入官，曾任泗州達魯花赤、御史。⁵³ 觀閭，字元賓，歷任惠州路同知、杭州路達魯花赤。在杭州任內有德政，至正十四年（1354）去任時，名詩人楊維禎（1296-1370）作〈送監郡觀閭公秩滿序〉，頌其忠孝。⁵⁴ 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破張士誠，徵元故官，觀閭嘆曰：「國危身虜，尙有頭戴南冠耶？」遂自經死，是一位爲元朝殉國的色目士人。⁵⁵ 危素稱他「讀書好古，廉而有爲」，王逢（1319-1388）亦稱其「平生善書詩，治績多可稱焉」，⁵⁶ 可見觀閭是一位既有文藝，又有治績，更有節操的士大夫。

《近思齋逸稿》中與二位舅父唱和詩共有三首。其贈丑閭之〈過宋邱太師宅種德堂〉中有句云：

往年外祖鎮江陰，伯舅重彈單父琴。

政化祇令誰第一，上書先奏德星臨。

⁵²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頁1上，〈古速魯公神道碑〉。

⁵³ 同上；《梧溪集》卷五，頁526，〈夢觀閭元賓〉。

⁵⁴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四部叢刊）卷四，頁7上-8上。

⁵⁵ 《梧溪集》卷五，頁526，〈夢觀閭元賓〉。

⁵⁶ 同上。

外祖係指達里麻吉而的，曾任江陰州達魯花赤，丑間此時顯然又任此官。

與觀間唱和的二首，一爲〈奉次二舅元賓使君見寄之韻〉：

一秋臥病紆懷抱，數枉高談慰客居。

清晝忽承新作寄，移時頓覺宿病除。

銀鉤鐵畫工何極，玉磬冰壺思有餘。

底事溪南來卜宅，祇應行待九重書。

由此詩可見甥舅二人往來及唱和之密及百遼遜對其二舅書法與詩藝之佩服。其〈留鐘山寄呈二舅元賓使君〉云：

吾舅挺人傑，濟濟惟王臣。三歲理邦賦，歸來大江濱。

驚呼見諸甥，意氣還自親。笑談絕時流，抗志懷經綸。

民瘼亦孔多，雖能爲酸辛。我皇實仁聖，唐虞豈難臻。

曷我行所願，伊周爾何人？

詩中表達甥舅二人久別重逢的喜悅及百遼遜對其舅經綸之材能的欽佩，同時也透露了這位年輕詩人本身的經國壯志。顯然百遼遜與其舅父的親密關係不僅是由於戚誼，而且基於對詩歌的愛好以及對儒家政治理念的共同信仰。

五、老師

在集慶地區，僦氏不僅是新居民，而且是外族。由於此一地區蒙古、色目居民不多，選師擇友，不免與漢族交往。⁵⁷

師生關係在儒家倫理中，與君臣、父子並列，是一種「擬親屬」的關係。在士人的社會網絡中，極爲重要。

⁵⁷ 溧陽州居民共有63,482戶，其中蒙古、色目人戶爲19戶。應皆爲遊宦於此而定居。集慶城設有錄事司，另有江寧、上元兩個附廓縣，三者共有居民70,187戶，錄事司有色目戶149，口2,919。上元縣有色目戶17（蒙古14，畏吾兒1，回回1，契丹1）。江寧縣外來人戶不詳。見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宋元地方志叢書）卷八，頁5上-12下。現在尚可考知當時定居溧陽的蒙古、色目人，有首任溧陽州達魯花赤木薛飛之後裔達氏、山東平章政事普顏不花的家族普氏、江東廉訪副使把把之後裔把氏。尤爲有趣的是這些外來家族子孫在明清時代曾相互聯姻（《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7上，〈題名〉。《嘉慶溧陽縣志》卷一〇，頁19下，〈選舉志·薦辟〉；卷一三，頁43下-44上，〈人物志·始遷〉；卷一四，頁13下-53下，〈人物志·完節〉）。又《嘉慶溧陽縣志》（卷一三，頁44上）引舊縣志：「溧族以畏吾、蒙古留居者尚有睦、聚、戍、那四氏，不知所出。」

漢學原為漢族人士的專擅，蒙古、色目人則較為後進。而且蒙古、色目仕進機會較佳，多數不必靠舌耕謀生，擔任教職者因而較少。以致在元代各族人士師生關係方面，大多係漢人為師，蒙古、色目人為生。

百遼遜的老師現尚可考者有曾文偉 (?-1341) 與儲惟賢。

曾文偉可能是偃氏居住龍興時的家庭教師。《近思齋逸稿》中有〈哀曾先生〉七言絕句四首，其序云：

至正元年冬十二月，先生曾君文偉卒於錢塘。其時臥病，不能往弔，含哀而已。今年春，因書帙得先生所為壽舍弟類詩一首，讀之如生，不勝悲悼。遂述四句，置諸其末，尚先生能聽之。

可見曾文偉於至正元年卒於錢塘，可能是杭州人，與百遼遜兄弟皆有情誼。其第三首有句云：「故國西江別有年」，可見關係始自江西。第四首云：

廬墓事終慚子貢，麥舟誰復是堯夫。

吞聲獨有巫陽些，欲託江流知聽無？

百遼遜自愧不能與為孔子守廬墓與心喪各三年的子貢相比而又招魂無術，可見百遼遜與曾文偉之間為師生關係，而且二人情誼深厚。

偃氏遷至溧陽後，家庭教師為儲惟賢，哲篤諸子皆從其受學，百遼遜亦在其中。孔克齊曾造訪偃氏書館，他在《至正直記》說：

高昌偃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為色目本族之首。世南以僉廣東廉訪司事被劾，寓居溧陽，買田宅，延師教子，後居下橋。世南（哲篤）有子九人（啓慶按：九人中有二人早夭），皆俊秀明敏，時長子燾（原註：本名傲伯遼孫）年將弱冠，次子十五六，餘者尚幼…。一日，予造其書館，館賓荆溪儲惟賢希聖主之，見其子弟皆濟濟有序，且資質潔美，若與他人殊者。⁵⁸

教師儲惟賢，字希聖，宜興荆溪人，荆溪與偃氏所住的下橋相互毗鄰，⁵⁹ 惟賢可說是當地士人，出身於一個鄉先生家庭。父能謙 (?-1344)，字有大，長於詩。惟賢於元統三年 (1335) 以《春秋》中江浙鄉試第四名。⁶⁰ 但不幸明年廢科舉，故

⁵⁸ 《至正直記》卷三，頁116-117，〈高昌偃哲〉。

⁵⁹ 《嘉慶溧陽縣志》卷首，頁1下，〈縣志圖〉。

⁶⁰ 宋濂，《宋文憲公集》（四部備要）卷三一，頁3下，〈元故樸巢處士儲君墓志銘〉；《危太樸文續集》卷五，頁19下-21下，〈宜興儲先生墓志銘〉；劉貞等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日本靜嘉堂文庫藏至正元年建安務本書堂刊本），〈春秋義〉第8場（無頁數）。

未能參加會試。科舉恢復後，於至正七年（1347）又中江浙鄉試第一，⁶¹ 卻在會試中落第，恩授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可說是場屋躑躅，命運弄人。

惟賢執教始於倪氏初遷溧陽，其時正在廢科之後，惟賢失望返鄉。當時百遼遜年已十七、八歲。不久之後，百遼遜常住集慶讀書，故其受教於惟賢的時間不長，而且惟賢第二次中鄉試時，百遼遜已於二年前登進士第，在功名上已超越乃師。不過惟賢與倪氏維持良好的賓主關係，百遼遜諸弟應是由惟賢繼續任教。至正四年（1344）儲能謙逝世時，惟賢即是央請由當時已膺任吏部尚書的哲篤為其父作行狀，並請翰林檢討危素撰墓志銘。危素俯允其請，一方面是由於「向居金陵，託交惟賢，有不可辭者」。⁶² 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倪哲篤的面子，因而危素寫道：「惟吏部（指哲篤）早擢進士，為時名臣，其文足以傳世矣」。

百遼遜從儲惟賢讀書的重點何在？李穡事後追敘百遼遜的早年說：「早歲遠學南方，年未踰冠，盡通學業，間攻古文，名遂大振」。⁶³ 百遼遜出身著名的科第之家，準備應試應是他早年讀書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儲惟賢是鄉貢進士，科第中人，輔導百遼遜兄弟預備考試，十分適合。不過由于科舉曾遭廢止六年，百遼遜自然未必一直專攻「學業」，古文與詩歌應是其研習的部分內容。

《近思齋逸稿》中並無與惟賢唱和的詩篇。卻有關於儲能謙的〈賦樗巢風月〉。小序云：「義興儲有大先生，以常所為詩，編成若干卷，自題曰：《樗巢風月》，其子希聖使公賦之」，可見此詩乃惟賢命其學生百遼遜所作。

曾文偉、儲惟賢皆為江南士人，反映出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子弟多奉南人為師，並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

六、朋友

在社會網絡中，朋友較家族、姻戚與師生更具擴張性與選擇性。家人、親戚與老師的數目都無法大量擴張，個人也不易主動選擇。朋友數目的多寡固然因人而異，而交友的對象也可根據個人的身分、學養、地緣、族群，乃至利害加以選擇。因而，朋友的交往既能反映個人的身分，亦能顯示其文化素養及政治社會策略。

⁶¹ 李先榮原本、阮升基增修，《嘉慶增修宜興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卷七，頁19下，〈選舉志·舉人〉）引儲氏家譜。

⁶²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頁20上，〈宜興儲先生墓志銘〉。

⁶³ 《近思齋逸稿》，李穡跋。

元代雖有族群等級制度，但族群等級並不構成朋友交往的鴻溝。各族人士互動的基礎是社會階層，而不是族群。蒙古、色目士人交往的主要對象是漢族士大夫而不是本族中下層。這一現象的造成不僅是由於蒙古、色目上層與中下層之間政治、社會地位的歧異，而且由於上層與中下層的漢化性質及速度之不同。一方面，蒙古、色目上層子弟漢化的速度與廣度皆大於中下層；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上層受到漢族士大夫文化薰染較大，而中下層則受漢族「小傳統」影響較深（見下文註104）。因而，蒙古、色目上層與漢族士大夫在社會、文化方面具有較大的同質性。

在集慶地區，百遼遜沒有一起成長的總角之交。其朋友多為遷居溧陽後的新知。其中固然有蒙古、色目人，更多為漢族。

（一）蒙古、色目

百遼遜唱酬的蒙古、色目朋友皆為供職集慶或路過此一地區的官員，尤其是江南行台中具有士人文化的年輕御史。楔哲篤曾於天歷二年（1329）擔任南台監察御史，⁶⁴ 百遼遜可能因其家世與這些年輕御史相結識，而由於共同的文化素養而唱遊。

篤（朵）列圖（1312-1348）是詩集中唯一的蒙古友人。篤列圖，字敬夫（甫），捏古台氏。原貫燕山（大都），後寓道州路錄事司。⁶⁵ 其父卜里雅禿思（1283-1341），是文宗（1329-1331）的潛邸舊臣，官至靖州路總管，⁶⁶ 其生母為漢人潘氏。篤列圖為至順元年（1330）右榜狀元。參加廷試時，文宗讀其卷，贊嘆說：「蒙古人文學如此，祖宗治教之所及也」，遂拔為第一。科舉座師馬祖常以妹妻之。因而其友人江陰名士王逢有「瓊林宴狀元，銀屏會佳婿」之詩句。篤列圖能文善詩，現存其詩二首及〈瑞鹽記〉一文。⁶⁷ 他又善于書法，曾為王逢蘿月山房書扇，可說是一位多才多藝，而備受各方重視的蒙古士人。其任南台御史

⁶⁴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60，〈題名〉。

⁶⁵ 《類編歷舉三場文選》癸集第四卷（無頁數），〈御試至順庚午科〉錄有其廷試對策。策首自署「大都路，見寓道州路錄事司」，可見篤列圖鄉試于大都。

⁶⁶ 虞集，〈道園類稿〉（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四六，頁23下-31上，〈靖州路總管捏古台公墓志銘〉。

⁶⁷ 王昶，〈金石萃編未刻稿〉（石刻史料新編）地卷，頁27上。

是在至元二年 (1336)，⁶⁸ 因而與百遼遜結識。當時他不過廿四、五歲，較百遼遜僅大六歲，年齡相差不大。百遼遜的〈賦得鳳凰台與篤敬夫御史〉一詩，即是二人共遊集慶名勝鳳凰台時所賦。篤列圖的族弟帖哥從其學，登至正五年進士第，⁶⁹ 是百遼遜的同年，亦是佳話。

百遼遜詩集中的色目友人有二，即答失蠻與脫脫木兒：

答失蠻，字彥修，阿兒溫氏，爲一伊斯蘭教徒。出身國子學，「留情詩書文藝之間」，⁷⁰ 尚有詩兩篇、⁷¹ 文一篇存世。⁷² 號雲松隱者，嘗自作圖，請著名士人題之，⁷³ 爲一位愛好風雅的色目士人。答失蠻官至秘書少監，而於至正三年任南台御史，⁷⁴ 百遼遜當在此時與其訂交並唱和。唱和詩二篇，一爲〈彥修御史請題清澈軒〉，是題答失蠻集慶住所之作。另一爲〈贈監察御史答失蠻彥修按行江浙行省〉，是在答失蠻執行御史任務巡察江浙時所作的送別詩。⁷⁵ 詩云：「聖主憂勤得雋賢，明公勲業屬華年。九秋一隼下空闊，四海群黎方倒懸」，可見答失蠻是一位仍在「華年」的年輕御史，百遼遜期盼他如臨空之隼，糾舉非爲，解民倒懸。

脫脫木兒，字時敏，號松軒，高昌畏兀兒氏，⁷⁶ 出身進士，至正四年任秘書監典簿，⁷⁷ 十七年 (1357) 以戶部侍郎出爲奉元路總管。長於詩、書，其作品傳世者尚有所題北宋詞人張先 (990-1078) 所繪《十詠圖》。《十詠圖》是一幅近

⁶⁸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62下，〈題名〉。

⁶⁹ 王逢，〈梧溪集〉卷三，頁463-464，〈故內御史捏古氏篤公挽詞〉。

⁷⁰ 危素，〈危太樸文集〉卷九，頁12上，〈雲松隱者圖序〉。

⁷¹ 佚名，〈詩淵〉（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第三冊，頁1634，〈宿武夷宮〉兩篇，作者題作「宋御史答失蠻彥修」，「宋」爲「元」之誤。

⁷² 沈垚，〈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卷二四，頁1上-4上，〈勝公和尚道行碑〉，至正十年答失蠻撰并書，時任秘書少監。

⁷³ 吳當，〈學言稿〉（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三，頁2上，〈答失蠻彥修號雲松隱者〉。

⁷⁴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頁64下，〈題名〉。

⁷⁵ 關於元代御史的巡察，參看洪金富，〈元代監察官吏的出巡〉，《新史學》13.2(2002)：157-175。

⁷⁶ 脫脫木兒題《十詠圖》時鈐印三方，「高昌氏脫脫木兒時敏印」、「清白堂」、「五城世家」，《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1513。五城即別失八里 (Besh Baliq)（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漢名北庭，爲畏兀兒國故都。

⁷⁷ 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高榮盛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九，頁182。

年因在大陸高價標售而轟動一時的名畫。⁷⁸ 此圖係以慶曆六年（1046）吳興太守馬大卿會六老於南園之故事，將十首不同內容的詩歌，集中於一個畫面。

脫脫木兒題《十詠圖》詩云：

吳興老子會南園，十詠于今只獨傳。

瀟灑丹青如一日，風流文采未千年。

情留去燕秋山外，興滿扁舟野水前。

慶曆向來詩不老，清興自覺侍郎賢。⁷⁹

此詩乃詠六老會之故事。脫脫木兒所題詩與陳振孫、鮮于樞（1257-1302）等宋元名士所撰並列，並不遜色。此外，脫脫木兒尚有所撰草書〈帥正堂漫刻〉存世。⁸⁰ 百遼遜為脫脫木兒所作〈騏驎行〉小序云「贈脫時敏典簿使還京師，元統丙子」，「元統丙子」即至元二年，其時脫脫木兒仍未任職典簿，應作於至正四年之後。此詩係百遼遜在脫脫木兒使畢還京時所作送別詩，以出典於《莊子·秋水》之「騏驎」喻脫脫木兒為一傑出人才。

以上三位蒙古、色目友人都是年輕官員，亦是多才多藝的士人。

（二）漢族

百遼遜的漢族朋友甚多，有的見於《近思齋逸稿》，有的其名不見於《逸稿》，卻有詩文與他相唱酬。見於《近思齋逸稿》的漢族朋友中，或是寓居集慶地區的官宦子弟，或是來往該地區的過客。

寓居集慶地區的兩位漢族友人——趙克讓、能伯元——皆為與他年齡相若的士子，而且和他的友誼最為篤厚。

趙克讓的本名與生平已不可考。僅知其為河南陳州人，尚在準備科舉。百遼遜有〈送趙克讓歸河南應舉詩七首〉（實為五首），詩云：

棲遲江南客，言還洛中社。折桂當早秋，飛雲繞親舍。

名駒出渥洼，墮地生南國。雖非風土宜，神駿邁飛翮。

⁷⁸ 周篤文，〈藝苑奇珍十詠圖〉，《文學遺產》1996.4：42-48；楊新，〈張先《十詠圖》：失而復得的國寶〉，《文物天地》1996.1：2-4。承石守謙教授惠告此畫種種，並提供相關資料，謹此致謝。

⁷⁹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1512。

⁸⁰ 宋伯魯編，《陝西金石志》（光緒五年刊本）卷二六，頁14下。

可見克讓在江南長大，可能是遊宦江南官員的子弟，正欲返回河南參加鄉試。吳中詩人鄭元祐（1292-1364）、于立皆有詩文送克讓返鄉赴舉。⁸¹ 元朝科舉鄉試，江浙、江西競爭最烈，江南士人往往冒籍至北方就試，趙克讓返回原籍應試，甚為自然。百遼遜遂以杜甫「對策君門期第一」為韻，祝他高中。

趙克讓顯然也是詩人，百遼遜與他唱和甚為頻繁。其〈有客行醉後贈趙克讓〉云：

有客有客字克讓，汝作新詩極悲壯。

和我〈君山〉之短歌，一夜長江起高浪。

朝來劍氣不能平，慷慨猶聞龍鳳鳴。

知我如君古來少，四海誰言無弟兄。

百遼遜對克讓的詩藝甚為佩服，而且視克讓為古來少有的知己。

能伯元，似為集慶路推官能鼎賢之子，能氏，河陰人。⁸² 百遼遜有〈臥病寄能伯元上舍、能言奈〉及〈次韻能伯元〉二詩與伯元相唱和。由前一詩題可看出能伯元為國子學生，而後一詩云：

學士行裝趨紫禁，野人祇合釣青溪。

尺書有意來相問，不在蓬萊弱水西。

此詩小序云：「至元丁丑作」，丁丑即至元三年（1337）。此時，能伯元已是國子學生，而百遼遜年方十九，尚為布衣，故自稱「野人」。

《近思齋逸稿》中有詩唱和的過客包括陳彥賓、汪伯羽兄弟、倪文德與楚人相士徐曄。⁸³ 其中有的是早已認識的舊雨，有的是透過他人介紹而結交的新知。

陳彥賓與百遼遜為舊識，重逢於集慶，故百遼遜〈惜別行贈陳彥賓〉云：

陳君難兄我畏友，十年不見先組綬。

金陵古城一相逢，話舊傾倒千壺酒。

其時彥賓即將赴京參加會試，百遼遜賦此詩送別，故詩云：

⁸¹ 鄭元祐，《僑吳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八，頁29下，〈送趙克上序〉（作於至正四年），「克上」應即「克讓」；顧瑛編，《草堂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一，頁18下，于立〈趙克讓歸洛陽赴舉〉。

⁸² 《至正金陵新志》卷三，頁18下，〈金陵世系年表〉至元二年條：「推官能鼎賢，河陰人。任內平反錄事司囚，…內外台察監察御史累荐，省部擬減一資」。

⁸³ 《近思齋逸稿》中另有〈送樂仲本歸四明〉，係為四明名儒程端禮之外甥樂良所作贈別詩。作於至正七年（1347），其時百遼遜已中第北徙，故非本文範圍。

淮南三月鶯花老，惜別不能悲遠道。

九天旭日射承明，聖主崇儒子年少。

陳君陳君行無遲，風雲有時當自爲。

明年我亦扣閭闔，賦詩贈君衣錦歸。

由於百遼遜明年亦將赴試，此詩固然是祝彥賓衣錦榮歸，亦是共勉之辭。

倪文德，鄱陽人，顯然爲一與百遼遜年齒相若的青年士子。〈贈倪文德秀才〉小序云：「鄱陽倪文德秀才以臨川危君太樸所爲贈行序過予溧上，而索詩還金陵。予嘉文德之有志，而愛危之言忠厚，於其別也，賦此予之」。倪文德是以著名士人危素所贈行序作介而訪見百遼遜於溧陽，百遼遜應其請而作此詩。詩中對危素之文才極爲推崇：「危君予未識，文燄逼韓歐」，同時亦寫下幾句與文德共勉的話：「力學男兒事，憂貧志士哈。祇應他日會，毋逸濟時材」。

汪伯羽兄弟，江西臨川人，伯羽似爲饒州宿儒李存（1281-1354）之弟子。⁸⁴ 伯羽東遊集慶，李存與名儒虞集（1272-1348）贈以詩文。李存賦贈之詩爲〈送汪伯羽遊金陵〉。⁸⁵ 伯羽以二人詩文示百遼遜，百遼遜爲其撰〈送別汪伯羽兄弟歸臨川〉，以壯行色。寓居集慶的天台士人丁復亦有詩懷伯羽，⁸⁶ 丁復當亦爲伯羽東遊集慶時所結交的友人。

徐曄，楚人，爲一相士。百遼遜〈送徐曄遊宣城兼柬稽月庭尊師〉中說：「徐君英妙齡，湖海早知名」，可見徐曄雖仍在英年妙齡，卻早已知名江湖，并亦能詩，曾以〈登九華山〉詩求和，百遼遜爲之作〈次韻徐曄登九華山詩〉。百遼遜與徐曄交好，固然由于對相人之術有興趣，亦由于徐曄善於吟詠。

其名不見於《近思齋逸稿》，卻有詩文與百遼遜相唱酬的早年友人則有鄭元祐、王逢。

鄭元祐爲百遼遜的前輩，字明德，處州遂昌人。僑居平江（蘇州）幾四十年，曾任平江路教授、江浙儒學提舉。⁸⁷ 元祐善詩文，文章滂沛豪宕，詩亦清峻蒼古。是崑山玉山草堂雅集的常客，吳中的大名士。元祐與百遼遜之祖父文質早

⁸⁴ 汪伯羽之父逝世，李存曾寄書弔慰，《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二九，頁677，〈慰汪伯羽〉。

⁸⁵ 《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九，頁575。

⁸⁶ 《草堂雅集》卷八，頁9上，〈懷汪伯羽〉。

⁸⁷ 蘇昌齡，〈元故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收入都穆編，《吳下塚墓遺文》（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69），卷二，頁18上-21上。

已認識，曾爲之作〈高昌偁氏三節堂記〉四言古詩，有句云：「侯既有子，且復有孫，孫皆讀書，益大侯門，相繼擢科，荐承寵光」。⁸⁸ 百遼遜曾遊平江，元祐應其請而作〈近思齋箴〉，⁸⁹ 語多勗勉。

王逢，字逢吉，江陰人，是元明之際浙西著名隱逸詩人，能詩善書，陶宗儀《書史會要》稱他「才氣俊爽，其屬辭於詩，尤長作行草，初非經意，大率具書家風範」。⁹⁰ 亂起之後，他隱居上海烏泥涇，早年卻是在故鄉度過，而江陰距集慶不遠，百遼遜與王逢結識于集慶，由于年齒相同，皆喜吟詠，遂建立頗深的友誼。百遼遜登第北上後，王逢有二詩寄贈，⁹¹ 〈寄偁公遠應奉〉是撰於百遼遜方登進士，初授翰林應奉時，詩中稱頌偁氏家人連連折桂登第，前程無限，「別來已覺升沉異，休問牛歌未出山」，表示彼此別後的升沈已互有差異，而其本人則無仕進之心。〈寄偁正字〉古體詩則是在百遼遜任端本堂正字時所作，前十二聯係稱頌偁氏家族及百遼遜本人的科業成就，後十二聯則敘述他本人屢次推卻台臣荐引，甘心隱遁。最後則以「好約重觴詠，秦淮夜對床」作結，可見仕隱的差異並未沖淡二人間的友誼，仍然相約在秦淮飲酒賦詩，聯床夜話。此外，《梧溪集》中亦有詩與百遼遜之弟偁吉斯相唱和及悼念其舅觀閭。⁹² 王逢可說與百遼遜家族具有二代厚誼。

由上看來，百遼遜的友人包括不同族群的青年士人。其中有蒙古、有色目、還有更多的漢人、南人。除去鄭元祐爲一前輩外，其餘各人之年齡皆與百遼遜相近，并具有相似的藝文造詣。他們或爲寄寓集慶的宦宦子弟，或爲來往的過客，但無真正的本地士人。而各族友人中，有的是已經登科的進士，有的是準備應試的舉子，有的是國子學生，身分與志趣大體與百遼遜相同，可見百遼遜交友的標準是學養與身分，而不是地域與族群。至於現存詩文集中缺少偁百遼遜與集慶當地士人交往的記載，一方面可能由於文獻本身的缺漏，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當時蒙古、色目上層子弟出仕中央機會較多，而無植根地方之需求。

⁸⁸ 《僑吳集》卷一，頁1上-1下。

⁸⁹ 《僑吳集》卷七，頁3上-3下，〈近思齋箴爲高昌偁公遠作〉。

⁹⁰ 陶宗儀，《書史會要》（洪武九年刊本）卷七，頁15下。

⁹¹ 《梧溪集》卷一，頁423；卷四，頁504。

⁹² 《梧溪集》卷四下，頁509-510，〈答偁嘉定公文遣書使請觀上丁禮〉；卷五，頁520，〈夢觀閭元賓〉。

七、方外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將元代高昌契氏列為「摩尼教世家」。實際上，自回鶻於八四〇年西遷，至一二〇九年歸順蒙古，其間宗教信仰發生甚大變化，摩尼教逐漸式微，而由佛教代興。契氏祖先中有人名和尚，元代契氏第三代中有人名答理麻，皆是佛教名詞，顯示契氏早已信仰佛教。⁹³

百遼遜雖以儒士自我定位，卻喜好與道釋遊。他的結交方外，可能因其年少多病，而有出世思想，但亦合乎中原士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中原士人雖皆以儒者自居，但在學問政事之餘，往往喜好研習釋道內典，并與道士、釋子遊，論道談禪以滿足內在的精神需求，亦是風雅的一種表現。僧道之中，學兼內外而又長於吟詠者也大有人在。他們亦樂于與士大夫相唱和，以抬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元代僧道之中善于文學而又與士人交往甚密者頗多，道士之中薛玄曦（1289-1345）、張雨、朱思本（1273-?）便是儒士喜好結交的對象，而釋門之中的「詩禪三隱」——天隱圓至（1256-1298）、笑隱大昕（1284-1344）、覺隱本誠等也與士人唱酬甚密。⁹⁴

《近思齋逸稿》中唱和的道士有薛鶴齋、自然道者及陳仁卿，而佛僧則有俊楚南、淨庵子。

道者三人中，薛鶴齋，本名毅夫，字茂弘，貴溪人，朱思本的弟子。朱思本出身正一教中心的江西龍虎山，為玉隆萬壽宮主持，也是著名詩人與輿地學者。⁹⁵ 鶴齋的學問文藝也受當代士大夫推重。危素稱鶴齋為「玄儒」，⁹⁶ 名儒虞集論其詩，稱為清新流亮，氣韻高爽，修然有出塵之思。⁹⁷ 百遼遜有〈贈薛鶴齋〉七律與他唱酬，末聯云：「何緣許借沖霄翮，直結雲松巢太清」，可見百遼遜有結巢太清的出世之想。

⁹³ 關於元代畏兀兒人的宗教信仰，參看黃時鑒，〈元代高昌契氏入東遺事〉，頁557-563。王梅堂，〈元代維吾爾族的宗教信仰及文化演變考述〉，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元代文化研究〉1（2001）：38-60。

⁹⁴ 陳得芝，〈略論元代的《詩禪三隱》〉，《禪學研究》1（1994）：88-101。

⁹⁵ 邱樹森，〈朱思本和他的《輿地圖》〉，收入邱氏《賀蘭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120-132。

⁹⁶ 《危太樸文續集》卷六，頁14上-15下，〈元故薛君思永配倪夫人墓銘〉。

⁹⁷ 貢師泰〈鶴齋記〉引虞集言，見貢師泰，〈玩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頁42上-43上。

自然道者，生平不詳，百遼遜〈贈自然道者〉云：

自然道者神仙侶，偶向塵寰學扁盧。

每以活人爲己任，謾將醫國許吾徒。

可見自然道者爲一精于醫術的道士，「以活人爲己任」，而將「醫國」的責任留于孔孟之徒。百遼遜可能因求醫而與他結識。

陳仁卿可能并非道士，而爲一青年慕道者，居住集慶城南。百遼遜〈移居竹林精舍（調陳仁卿）〉云：

遜也千巖萬壑姿，生來雅與世相違。

每尋明月獨垂釣，時向白雲還採芝。

讀書有得死亦樂，學道無成身後悲。

寄謝城南陳處士，好將丹灶善扶持。

詩中首字「遜」乃百遼遜自稱。百遼遜在此詩中亦顯露出強烈的慕道傾向，二人的友誼應是建立在共同「學道」上。

佛僧二人爲俊楚南、淨庵子，事蹟皆不可考。俊楚南顯然爲一前輩僧人。⁹⁸百遼遜〈送俊楚南上人〉有「何當從子去，複製芰荷衣」之句。「芰荷衣」之典出於《離騷》，意指屈原退隱時所制的衣裳。此詩亦顯示百遼遜的出世思想。

關於淨庵子，百遼遜〈次韻答淨庵子〉云：

城南野衲淨庵子，七尺枯藤一瓣香。

每愛山林求定靜，卻憑詩酒散疏狂。

淨庵子顯然爲一詩酒風雅的僧人，百遼遜因而與其唱和。

與百遼遜有交往而在《近思齋逸稿》未提及的方外之交尚有釋大昕。大昕，俗姓陳，江西南昌人，元朝中期聲勢最爲顯赫的政治和尚，也是著名的「詩禪三隱」之一。元文宗於至順元年（1328）即位，改建其在集慶之舊居爲大龍翔集慶寺，⁹⁹任命他爲開山住持，此寺地位在江南五山十刹之上，而大昕在任前後十七年，所受「聖眷」甚隆，社會名望頗高，交遊極廣。求得其詩文者亦多，著有《蒲室集》，今存。百遼遜寄居集慶，央請此一當地著名前輩僧人爲其書齋作

⁹⁸ 俊楚南一名，楚南應爲其字，俊應爲其法號之第二字，其人已不可考。

⁹⁹ 關於大龍翔集慶寺，參看丁國範，〈關於大龍翔集慶寺的舊址問題〉，收入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342-353。

銘，甚爲自然。¹⁰⁰

總之，雖然百遼遜出身官宦科第世家，又以儒士自居，並且積極追求功名，卻因年少多病而懷有出世思想，喜與僧道交遊，以求滿足內在的精神需要。此亦合乎漢族士人「出世」與「入世」兼顧之傳統。而且與他唱遊的方外之士，大多能文善詩，其文化及品味與士人相差不大。故其與方外之士的交遊可視爲與士人唱和的延伸。

八、結論

百遼遜的社會網絡反映出元季江南社會中一個色目青年士人的生活世界。他與這個網絡中人物的互動塑造了他的人格與文化，也奠定他未來社會與政治關係的基礎。

百遼遜的社會網絡是以其家族爲中心而向外推展。楔氏雖爲畏兀兒族，卻是元朝中葉以後日益擴大的蒙古、色目士人層及多族士人圈的一環。楔氏與若干顯赫的畏兀兒家族結合爲一個實質的婚宦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家族相互之間不僅具有盤根錯節的婚姻關係，而且擁有共同的漢學傳統，其子弟皆深受漢學的陶冶。楔氏尤以輝煌的科第成就與森嚴的禮教門風著稱。百遼遜自幼即受嚴格的禮教規範與士人文化的薰陶，他與家族及姻戚的互動也是以儒家禮教與士人文化爲基礎。

在家族、姻戚之外，百遼遜的社會網絡亦反映他的士人身分、學養與品味。他的師友——包括方內與方外——都是廣義的各族士人。現尚可考的二位老師——曾文偉與儲惟賢——分別爲杭州與宜興人，顯示出定居江南之蒙古、色目子弟追隨漢族教師學習的普遍性。他的蒙古、色目友人——篤（朵）列圖、答失蠻、脫脫木兒——皆爲藝文有成的士人。其漢族友人或爲同輩的年輕學子，或爲年長的成名文士，其中與他氣味最爲相投，友誼最爲篤厚的則是幾位年齒相若的漢族青年士人。百遼遜與這些友人皆是基於共同的學養與品味而結合。即是幾位方外之交與百遼遜也有「詩酒疏狂」的共同愛好。

¹⁰⁰ 釋大昕，《蒲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五，頁7下-8上，〈近思齋銘爲楔公遠作〉。

偃氏家族在江南定居雖然已有四五十年，在江東地區則是新居民，而百遼遜則是在十七歲時遷至溧陽，在集慶地區沒有一起成長的老朋友。他的師友之中唯一的本地土人是其塾師儲惟賢，其友人或為供職江南行台的年輕御史，或為寄寓集慶的官宦子弟，或為過往的文人雅士。元代中期以後，蒙古、色目在中原、江南多已落地生根，各自建立地域社會網絡。如出身汪古族的科第前輩馬祖常之在光州、哈剌魯族的詩人迺賢（1309-?）之在慶元、¹⁰¹ 出身軍人家族的楊崇喜之在濮州都已在當地建立豐厚的人脈，甚至扮演地方菁英的角色——建書院、立鄉約等。¹⁰² 而百遼遜社會網絡的地域基礎則甚薄弱。

由以上文看來，百遼遜所承繼與營造的是一個青年科第士人的社會網絡，與漢族士人差別不大。由於偃氏家族持續與本族聯姻，而且直至百遼遜一代仍然保持畏兀兒式的名字，¹⁰³ 反映偃氏仍未完全放棄原有之族群認同，若說此一家族在當時已經完全「漢化」，或許不免引起爭議。但由百遼遜的社會網絡看來，稱之為「士人化」，¹⁰⁴ 應屬允當。因其交往皆以士人為對象，並且以具有普世價值的士人文化為互動基礎，超越了族群鴻溝與地域藩籬。偃氏無疑為一士人化的色目家族，而百遼遜為一青年士人。

在元季蒙古、色目族群中，百遼遜有多大代表性？偃氏家族在當代蒙古、色目人中無疑是研習漢學的先驅、最成功的科第世家，卻非絕無僅有。蒙古人中的答祿乃蠻氏，色目人中的高昌廉氏、汪古馬氏及康里不忽木（1255-1300）家族等鑽研漢學之早，造詣之高，皆不下于偃氏，而在科舉方面亦都各有斬獲，雖然在考場中的聲勢比不上偃氏，在士人化的程度上卻未遑多讓。¹⁰⁵ 而且元代中期科

¹⁰¹ 陳高華，〈元代詩人迺賢事跡考〉，《文史》32(1990)：247-262。

¹⁰² 焦進文、楊富學校注，〈元代西夏遺民文獻《述善集》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

¹⁰³ 蕭啓慶，〈蒙元時代高昌偃氏的仕宦與漢化〉，頁291-294。

¹⁰⁴ 「士人化」(literatization) 與「漢化」(sinicization) 的區別：「漢化」之異族人士應已放棄其本族文化及族群認同，而與漢族同化，但可能僅接受漢人的「小傳統」，不必熟諳士人文化，歷代與漢族長期接觸的異族下層民眾大體如此。而「士人化」之異族人士雖接受士人文化，卻未必放棄其本族的族群認同，甚至選擇性保留其原有文化。元代中後期不少蒙古、色目人皆是如此，因為在征服情勢下，蒙古、色目人保持其原有的族群及政治認同對其實際利益有助。因而當時蒙古、色目士人往往存有族群及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相互矛盾的現象。參看蕭啓慶，〈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遊寓興詩集》〉，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頁299-322。

¹⁰⁵ 蕭啓慶，〈元代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漢學研究》18.1(2000)：101-128。

舉的恢復對蒙古、色目人研習漢學具有甚大的激勵作用，甚多下層蒙古、色目官員乃至軍戶子弟亦開始讀書應試，並成為元季日益擴大的多族士人圈的一部分。¹⁰⁶ 楔百遼遜的社會網絡便是這個多族士人圈的縮影。這個縮影雖然與整體在某些方面有些差異，卻反映了元季族群社會文化互動的方向。

（本文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¹⁰⁶ 蕭啓慶，〈元代蒙古色目士人層的形成與發展〉，頁175-17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
-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慶州僕氏諸賢實記》，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藏抄本。
- 孔齊（孔克齊），《至正直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 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 王昶，《金石萃編末刻稿》，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王逢，《梧溪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佚名，《詩淵》，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 吳當，《學言稿》，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伯魯編，《陝西金石志》，光緒五年刊本。
- 宋濂，《宋文憲公集》，四部備要，臺北：中華書局，1965。
-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李先榮原本、阮升基增修，《嘉慶增修宜興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 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 李景嶧等修，《嘉慶溧陽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 李穡，《牧隱文稿》，麗季名賢集，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59。
- 沈垚，《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
-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
- 貢師泰，《玩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 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宋元地方志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80。
- 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 都穆編，《吳下塚墓遺文》，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69。
- 陶宗儀，《書史會要》，洪武九年刊本。
- 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店，1991。
- 焦進文、楊富學校注，《元代西夏遺民文獻〈述善集〉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
- 馮登府，《閩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
-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四部叢刊。
虞集，《道園類稿》，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雷禮，《國朝列卿記》，明代傳記叢刊。
劉岳申，《申齋文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劉貞等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日本靜嘉堂文庫藏至正元年建安務本書堂刊本。
鄭元祐，《僑吳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鄭麟趾，《高麗史》，東京：國書刊行會，1909。
釋大昕，《蒲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顧嗣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顧瑛，《草堂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二、近人論著

丁國範

- 1996 〈關於大龍翔集慶寺的舊址問題〉，收入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342-353。

王梅堂

- 1999 〈元代內遷畏兀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論叢》7：123-136。
2001 〈元代維吾爾族的宗教信仰及文化演變考述〉，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元代文化研究》1：38-60。

北村高

- 1993 〈關於孟速思家族供養圖〉，《元史論叢》5：9-12。

朴現圭

- 1996 〈回紇人僕遜《近思齋逸稿》之發掘、分析〉，《民族文學研究》1996.2：89-93。

周篤文

- 1996 〈藝苑奇珍十詠圖〉，《文學遺產》1996.4：42-48。

邱樹森

- 1997 〈朱思本和他的《輿地圖》〉，收入氏著，《賀蘭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20-132。

姜一涵

- 1981 《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洪金富

- 2002 〈元代監察官吏的出巡〉，《新史學》13.2：157-175。

蕭啓慶

胡其德

- 1995 〈元代畏兀人華化的再檢討——一個新的詮釋〉，收入蒙藏委員會等編，《中國邊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頁169-201。

徐桂香

- 1986 《元代的集慶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桂栖鵬、尙衍斌

- 1995 〈談明初之中朝交往的兩位使者——契長壽、契斯〉，《民族研究》，1995.5：65-69。

陳 垣

- 1935 《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

陳高華

- 1990 〈元代詩人迺賢事跡考〉，《文史》32：247-262。

陳得芝

- 1994 〈略論元代的《詩禪三隱》〉，《禪學研究》1：88-101。

黃時鑒

- 2001 〈元代高昌契氏入東遺事〉，載于蕭啓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店，下冊，頁541-569。

楊志玖

- 1988 〈古速魯氏非回回辨〉，《寧夏社會科學》1988.3：1-2。

楊 新

- 1996 〈張先《十詠圖》：失而復得的國寶〉，《文物天地》1996.1：2-4。

楊 鐸

- 1998 《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葉泉宏

- 1993 〈契氏家族與元末鮮初之中韓關係〉，《韓國學報》12：59-79。

蕭啓慶

- 1983 〈元代的宿衛制度〉，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59-111。
- 1994 〈元代蒙古人的漢化〉，收入氏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公司，頁219-264。
- 1994 〈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收入氏著，《蒙元史新研》，頁95-216。
- 1997 〈元代各族士人間的文化互動：書緣〉，《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臺北：簡牘學會，頁349-379。
- 1997 〈元朝多族士人的雅集〉，《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6：179-203。

- 1999 〈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遊寓興詩集》〉，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頁299-322。
- 1999 〈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8.2：66-73。
- 1999 〈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頁203-242。
- 1999 〈蒙元時代高昌偃氏的仕宦與漢化〉，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頁243-297。
- 2000 〈元代蒙古色目士人層的形成與發展〉，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回饋——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68-183。
- 2000 〈元代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漢學研究》18.1：101-128。
- 2001 〈元至正前期進士輯錄〉，《燕京學報》10：173-209。

Franke, Herbert

- 1994 "A Sino-Uighur Family Portrait: Notes on a Woodcut from Turfan," in H.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Chap. XIII.

Hsiao, Ch'i-ch'ing

- 1993 "Lien Hsi-hsien," in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Wiesbaden: Harrasowitz, pp. 480-499.

Tu Fang, Lienche

- 1976 "Hsieh Ssu," in L. C.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59-561.

The Social Networks of Semu Literati in the Late Yuan Period: Xie Boliaoxun as a Young Man

Ch'i-ch'ing Hsiao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hina under the Mongol Yuan rule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wa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constitute a major focus in Yuan studies.

Mainly based on a poem collection recently discovered in Korea, *Jinsizhai yigao*, this paper offer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social network of a Uighur young man, Xie Boliaoxun (1319-1360),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six core sections of this paper examine how this young man interacted with his kin, teachers, friends, and Buddhist and Daoist monks and how his growing process,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 culture were affected by his social surroundings. Xie Boliaoxun's social network is studi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ways in which Semu young men grew up in Jiangnan society and the general direction in which the interethnic socio-cultural relations moved in late Yuan.

A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show, the social network of Xie Boliaoxun was one of the Confucian literati, since most persons closely interacting with him were literati and the basis on which they interacted was common literati culture. However, their close marital ties with other Uighur families and their retention of Uighur style of familial and personal names indicated that the Xies did not yet give up their original ethnic identity.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use the term "sinicization" to describe the socio-cultural status of the Xies and many other Mongol and Semu families like them in the late Yuan. The new term "literatization" would serve that purpose better.

Keywords: Yuan dynasty, Semu, social network, Xie Boliaoxun, literatization